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来自浙江省海盐县的调查¹

黄文秀，杨卫忠，钱方明，繆仁余

【摘要】：文章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浙江省海盐县 260 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达到识别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目的。研究发现：①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自己和家人就业情况、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环境污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②户籍制度、小孩受教育、社会保障、田园劳作方式、消费货币化、生活环境变化、原住居民的偏见与歧视、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权、食品安全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未产生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影响因素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城市化问题，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①。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即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②。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新型城镇化问题，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和农村服务业，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③。这意味着，就地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

在学术界，就地城镇化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肯定就地城镇化的意义、作用（潘海生等，2010；张国玉，2014；赖扬恩，2013），但也有些学者指出了就地城镇化的问题（石忆邵，2013；吴春飞，2014；杨萍，2014）。为了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有些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存在问题等。祁新华等（2011）建立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模型，选择 3 个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和迁移意愿。胡银根（2014）通过对湖北省 4 个典型农村的调研，总结就地城镇化的经验，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吴春飞等（2014）对福建晋江市、石狮市 8 个典型城中村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地区就地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中村社会空间特点、存在问题。为了考察就地城镇化的实际效果，有些学者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满意度调查，分析其对就地城镇化的评价及影响因素。陈占锋（2013）采用结构方程研究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吴琴（2015）以重庆的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对农户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胡小芳等（2014）对湖北省彭墩村进行了农村宅基地置换满意度调查。刘新智等（2015）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对其所在城镇满意度评价进行分析。俞贺楠、蔡泽昊（2015）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养老保险参保的现状、需求及满意度。崔光胜（2014）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角度对失地农民生活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张贝贝（2015）通过对河南省各地市 52 例城镇化建设样本进行调查，对影响人们城镇化满意

¹[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5AJY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40310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LY14G030016），浙江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编号：2016C25011）。

[作者简介]：黄文秀，嘉兴学院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通讯作者杨卫忠，嘉兴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作者钱方明，嘉兴学院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作者繆仁余，嘉兴学院商学院讲师。

度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因子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就地城镇化的意义、模式、动力机制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也开展了对城镇化的满意度调查分析，但有关农业转移人口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深入研究则较少。而农业转移人口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直接影响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前景，决定了其成功与否。因此，本文将通过实地数据调查探析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户籍制度、小孩受教育及社会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核心问题便是户籍制度问题（刘新智等，2015）。农业转移人口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小孩就学、社会保障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实质上是一种“半城镇化”的状态（唐丽萍、梁丽，2015）。因此，户籍制度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对就地城镇化的满意程度。小孩教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业转移人口迫切关心的问题（黄振华，2014），影响其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判断。社会保障将直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未来生活，他们十分关注就地城镇化后社会保障解决的程度。因此，社会保障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1a：户籍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1b：小孩受教育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1c：社会保障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二）进入城镇就业谋生、经济收支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就业谋生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即使有工作也可能对岗位并不满意，而老年人则因缺乏相应的技能难于找到工作。农业转移人口如果没有获得稳定收入的岗位，就会缺乏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主要诉求是稳步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非农就业收入（奚建武，2014）。农民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的提高会提升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胡恒钊、文丽娟，2015）。因此，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是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的问题。在进入城镇前农民基本可从土地上获得基本的必需品，但一旦失去土地，农业转移人口必须用货币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就地城镇化加速了消费货币化进程，导致货币压力开始向其工作和生活多方展开，各项生活消费支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甘小文等，2011）。因此，消费货币化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程度。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2a：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2b：消费货币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三）乡土情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

就地城镇化将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和对城镇化的评价。中国农民具有浓厚的家园和土地情结，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乡土情结会越来越浓烈，故土难离的情绪益发高涨（贾淑军，2012）。同时，有些农民还习惯于传统的耕作方式，留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可能对快节奏的城镇生活难于适应，传统小庭院式的农村生活与职业工人的角色短期内难以转变和适应（胡银根等，2014）。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后会留恋乡土。

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3a：留恋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3b：留恋田园劳作模式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四）城镇生活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

生活环境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重要指标（陈占锋，2013）。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社区生活后，生活环境将发生变化，这将影响其幸福感。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社会参与、交往和心理认同等都存在不小的障碍（李强等，2016）。长期的城乡隔离和城市户籍的优势滋生了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性偏见和歧视（胡杰成，2007）。农业转移人口迁入城镇或农村社区后，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对农产品的安全也有深深的担忧。中国的污染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2014）。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4a：生活环境变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4b：原住民的偏见与歧视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4c：食品安全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4d：环境污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五）土地流转补偿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④

土地流转是农业转移人口都要面对的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工作亟待加强（李奋生，2012）。程昊暘、叶继红（2011）的研究表明，土地补偿额度影响失地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调整，农村户口所附带的优惠条件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唐丽萍、梁丽，2015）。失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过低、补偿不到位与土地征收后带来的巨大利益形成鲜明的反差，激发了农民尝试使用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诉求（丁明秀，2014）。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5a：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5b：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六）民主政治权利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居住的分散性使其政治参与度普遍不高，而当农业转移人口集聚到城镇后，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萨茹拉，2013）。农业转移人口普遍缺乏民主参与意识，大部分人无法真正维护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李强，2014）。相对来说，年轻一代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愿会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周庆智，2015）。城镇化激发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对参与民主政治上尽管有所需求，但在城镇化后却面临缺乏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对民主政治权利没有话语权（刘玉侠、方森君，2014）。农业转移人口关心农村宅基地置换过程中集体资金、政府资金的使用情况（胡小芳等，2014）。基此，提出研究假说：

H6a: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H6b: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海盐县位于浙江省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陆地总面积 534.73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37.9 万人,下辖武原、秦山、元通、西塘桥 4 个街道,沈荡、百步、于城、澉浦、通元 5 个镇,49 个城市社区,85 个行政村。海盐县积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利用嘉兴学院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平台对海盐县就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走访和问卷调查来获得数据。选取海盐县武原镇、秦山镇、百步镇目标地区,共发出 26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42 份,有效率为 93.082%。

(二) 变量测量

1. 控制变量的测量。性别和家庭成员结构设定为二分类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由实际数据测量。健康状况设定为多级分类变量,以“不好”为参照组,对应于“一般”和“良好”。

2. 解释变量的测量。户籍制度采用“能否解决城镇户籍”进行测量。可以解决的样本所占比重为 89.7%,没有办法解决的仅 10.3%,这说明被调查样本中绝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可以解决城镇户籍问题。小孩受教育采用“能否很好地得到解决”进行测量^⑧。解决得好的样本所占比重为 95.5%,仅 4.5%认为解决得不好,这说明海盐县大力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较好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社会保障采用“能否很好得到解决”进行测量^⑨。解决得好的样本所占比重达到 80.6%,只有 19.4%认为解决得不好,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海盐现有社会保障水平比较满意。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和田园劳作方式均采用“是否留恋”进行测量。不留恋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和田园劳作方式的样本所占比重分别为 63.6%和 67.4%。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不留恋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和农村生活。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采用“就业情况如何”进行测量。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为多级分类变量,“差”、“一般”和“良好”分别占 3.7%、58.3%和 38%,表明被调查者对就业的评价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对就业有较高的期待。消费货币化采用“严不严重”进行测量。严重的样本所占比重为 65.7%,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城镇化后的消费货币化严重程度较高。生活环境变化采用“适应情况如何”进行测量。容易的样本所占比重为 92.1%,说明被调查者适应就地城镇化后生活环境的变化。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均采用“是否合理”进行测量。这两个样本合理的所占比重分别为 65.3%和 66.9%,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流转补偿是合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权”均采用“是否得到保障”进行测量。这两个样本得到保障的所占比重分别为 70.7%和 71.5%,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民主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食品安全采用“是否放心”进行测量,放心的占 75.2%,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是放心的。环境污染采用“是否严重”进行测量,不严重的占 67.4%,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环境污染不严重。

3. 被解释变量的测量。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采用“满意和不满意”进行测量。对就地城镇化满意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为 92.1%。这表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就地城镇化表示满意。

(三) 模型选择

选择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 MLS 参数估计。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_j = F\left(\alpha + \sum_{i=1}^m \beta_i X_{ji} + u\right) = \frac{1}{1 + \exp\left[-\left(\alpha + \sum_{i=1}^m \beta_i X_{ji} + u\right)\right]} \quad (1)$$

根据式 (1) 进行 Logit 变换, 得到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线性模型:

$$\ln \frac{P_j}{1-P_j} = \alpha + \sum_{i=1}^m \beta_i X_{ji} + u \quad (2)$$

式 (2) 中, P_j 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对就地城镇化表达满意的概率; X_{ji} ($i=1, 2, \dots, m$) 为自变量; β ($i=1, 2, \dots, m$)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不变时, 该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发生比率 (odds ratio) 即 $\text{Exp}(B)$ 的自然对数的变化, 其中, odds 表示农业转移人口满意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 (王济川等, 2004); α 为截距项, u 为误差项。

三、结果分析

经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 所有自变量的 TOL 值均远大于 0.3, 因此便可认为, 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Cohen 等, 2003)。从表 2 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看, McFadden R-squared 值大于 0.2 而接近于 0.4, 说明该模型拟合程度较高。同时, LR 检验统计量及其概率值均表明该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显著。

1. 控制变量的影响。控制变量中仅家庭规模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2. 解释变量的影响。解释变量中仅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环境污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而其他变量未产生显著影响。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变量系数为 -3.083 (p 值=0.0159), 表明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率产生显著影响。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变量的系数为 1.199 (p 值=0.0931), 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说明他们非常关注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就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变量的系数为 1.822 (p 值=0.0470), 表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他们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环境污染变量的系数为 1.533 (p 值=0.0688), 说明环境污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小孩受教育程度、消费货币化、生活环境变化、原住民的偏见与歧视、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等变量未对就地城镇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从调查情况看, 海盐农业转移人口对户口是否为城镇户口已不太关注, 甚至不愿意把户口迁往城镇。海盐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 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小孩受教育程度、原住民的偏见与歧视、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等问题不是很关注。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				
	系数	标准误差	Z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Exp (B)
性别	-1.2150	0.7550	-1.6092	0.1076	0.2967
年龄	0.1736	0.3274	0.5302	0.5960	1.1896
健康状况	0.7161	0.5255	1.3627	0.1730	2.0464
家庭规模	-0.8985**	0.3848	-2.3351	0.0195	0.4072
受教育程度	0.3649	0.4775	0.7641	0.4448	1.4404
家庭月均收入	0.2278	0.2557	0.8907	0.3731	1.2558
户籍制度	0.5136	1.0944	0.4693	0.6388	1.6713
小孩受教育	0.4727	1.3996	0.3377	0.7356	1.6044
社会保障	0.6334	0.8355	0.7581	0.4484	1.8840
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	-3.0832**	1.2782	-2.4122	0.0159	0.0458

田园劳作方式	1.2123	1.0942	1.1080	0.2679	3.3612
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	1.1990*	0.7140	1.6793	0.0931	3.3167
消费货币化	0.8509	0.7711	1.1035	0.2698	2.3418
生活环境变化	1.0048	0.9371	1.0723	0.2836	2.7314
原住居民的偏见与歧视	-0.3353	1.5351	-0.2184	0.8271	0.7151
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	0.4806	0.9134	0.5261	0.5988	1.6170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	-1.2646	0.9601	-1.3171	0.1878	0.2824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8219**	0.9173	1.9861	0.0470	6.1833
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权	0.0089	0.9548	0.0093	0.9926	1.0089
食品安全	1.1208	0.8391	1.3357	0.1816	3.0673
环境污染	1.5325*	0.8421	1.8199	0.0688	4.6299
常数项	-6.4886	4.4099	-1.4714	0.1412	0.0015
McFadden R-squared				0.3951	
AIC 值				0.5146	
SC 值				0.8318	
LR 检验统计量				52.6141	
LR 检验统计量概率值				0.0002	

注：①*、**和***分别表示统计检验达到 10%、5%和 1%显著性水平；②McFadden R-squared 值越大，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越高；LR 检验统计量及其概率值，表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转移人口生存状态视角建立实证分析框架，分析浙江省海盐县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农业转移人口对户籍制度、小孩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生活环境变化满意的比例相对较高，留恋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田园劳作方式的比例较低。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户籍、小孩受教育、社会保障、田园劳作方式、消费货币化、生活环境变化、原住居民偏见与歧视、土地经营权流转补偿、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等并未表现出强烈关注。第三，留恋农村生活与居住方式、自己和家人城镇就业情况、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环境污染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第四，尽管农业转移人口表示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但食品安全对其就地城镇化满意度未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以增加就业机会为工作重点，努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收入水平。就地城镇化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为此，应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其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当地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第二，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教育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整体素质。开展多种形式教育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适应城镇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不断提升他们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第三，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归属感。加强社区载体和平台建设，增强农业转移人口主体权利意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培养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政治参与能力，提高他们对城镇的归属感。第四，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优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镇化建设格局，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

注 释：

①资料来源：2013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共产党网（www.12371.cn），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

②资料来源：2014 年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2014 年 3 月 5 日。

③资料来源：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16 年 1 月 28 日。

④农村土地流转包含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两个方面。其中，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分离转让给经营权给其他人或经济组织的行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指依法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转让使用权给他人或经济组织的行为。

⑤海盐县政府对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小孩受教育问题普遍可以解决。因此，本文将小孩受教育变量设定“解决得不好”与“解决得好”两个测量维度。

⑥海盐县基本覆盖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但城乡差别仍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仍然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本文将社会保障变量设定“解决得不好”与“解决得好”两个测量维度。

[参考文献]:

1. 潘海生、曹小锋：《就地城镇化：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浙江小城镇建设的调查》，《城市化建设》2010 年第 9 期。
2. 张国玉：《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地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3. 赖扬恩：《坚持走有利于民生改善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 23 期。
4. 石忆邵：《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发展》，《经济地理》2014 年第 33 期。
5. 吴春飞等：《就地城镇化地区的城中村研究——基于福建晋江市、石狮市 8 个典型城中村的实证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4 年第 21 期。
6. 杨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就地城镇化模式优化路径分析》，《商业时代》2014 年第 17 期。
7. 祁新华等：《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地理科学》2012 年第 1 期。
8. 胡银根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湖北省襄阳市 4 个典型村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9. 陈占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10. 吴琴：《农户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重庆例证》，《知识经济》2015 年第 17 期。
11. 胡小芳等：《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宅基地置换满意度研究——基于湖北省彭泽村的调查》，《中国土地科学》2014 年第 12 期。

-
12. 刘新智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镇满意度评价——基于川渝的调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13. 俞贺楠、蔡泽昊:《新型城镇化下农业转移人口养老保险参保需求及满意度研究——基于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
 14. 崔光胜:《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调查——基于湖北省若干县、市的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5. 张贝贝:《城镇化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16. 唐丽萍、梁丽:《适用与限度:我国就地城镇化研究》,《求实》2015年第7期。
 17. 黄振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需求——基于7687位农民的实证》,《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8. 奚建武:《新型城镇化:对过往城镇化的解构与超越》,《理论视野》2014年第6期。
 19. 胡恒钊、文丽娟:《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态势、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以广东、江西、湖北、四川四省为分析案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20. 甘小文:《城镇化对农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企业经济》2011年第6期。
 21. 贾淑军:《城镇化中农户移居与农民工转户意愿研究——以河北唐山为个案》,2012年第11期。
 22.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3. 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兰州学刊》2007年第7期。
 2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管理世界》2014年第4期。
 25. 李奋生:《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特区经济》2012年第10期。
 26. 程昊旻、叶继红:《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类型与机理研究》,《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27. 丁明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农业经济》2014年第7期。
 28. 萨茹拉:《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关系研究》,《财经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29. 周庆智:《城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体制转型——基于中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
 30. 刘玉侠、方森君:《城镇化中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1. 王济川、郭志刚: 《Logistic 回归模型: 方法及应用 (第 2 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32. Cohen, J., Cohen, P., West, S.G., and Leonal, S.A.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3.